新闻热线：010—58884094
E-mail：stpinglun@126.com
科技日報
■责编 徐 玢
2014年3月21日 星期五

互联网金融的趋势不可逆转

□ 道 田

自从微信有了数亿的用户基础、余额宝吃了互联网金融的螃蟹之后，微信支付以及相关互联网金融在市场上炙手可热，2013年甚至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不过，近日这些金融创新却遭遇了当头棒喝，其原因是央行紧急叫停了二维码支付以及虚拟信用卡，理由是需要对该类业务的合规性、安全性进行总体评估。央行文件称，二维码支付的安全性尚存质疑，存在一定支付风险隐患；虚拟信用卡在客户身份识别、信息安全方面尚待进一步研究。

不过仔细分析，文件叫停的理由并不能完全站住脚。如果说二维码支付存在风险隐患，那么对比今天已广泛使用的信用卡，二者的风险孰重孰轻还很难说，当前信用卡的各种倒刷、恶意透支等安全事件是层出不穷。至于虚拟信用卡方面，既然钱就是一串数字，身份证证明也是一串数字，在货币电子化、各种身份识别技术和虚拟技术服务（如虚拟运营商）已很常见的今天，虚拟信用卡的身份识别和信息安全问题也不是个问题。

说完了安全性，再说合规性。可以想见，面对蓬勃发展的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庞大复杂的行政体制并不可能及时制定出有关法规予以规范，那么央行所说的合规性其实是个伪命题，央行在文件中也未能明确指出依据的是什么规定。

于是，社会只能从其他方面来理解。很多人从利益角度道破了玄机，那就是互联网金融动了银联等传统金融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传统的体制也必然倾向于保护传统的既得利益者，这正是对市场和创新活力的伤害。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历史潮流，笔者认为，监管部门更合理的对待方式，应该是坚持底线思维，移植互联网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要有底线思维；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说，要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还有在自贸区以及多个领域推广实施的黑名单制等等，都是底线思维的体现。因此，在不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之上，各种创新的业态都应该是被允许的，或者至少是可以鼓励和尝试的，匆匆叫停或者一棍子打死必然是一种武断。有底线思维的监管者才是开明的市场经济的践行者。

在笔者看来，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就是群体消费者参与的创新。如果说以前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是创新的主体，现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么未来的趋势将是消费者参与的创新。正所谓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高手在民间，谁能通过互联网有效集结可以裂变的市场智慧和力量，谁就是市场的赢家。各种互联网应用为何要不惜代价先积累用户，人肉搜索的威力又为何这么大，道理是一样的。具备互联网思维的监管者才能洞察行业的发展和本质，才能避免外行指挥内行。

从QQ到微信，腾讯打破了传统电信运营商的藩篱；从支付宝到余额宝，淘宝进入了银联、银行的领地；还有更多的行业正在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改变。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为何不在拥抱变革中实现融合发展呢？

因此我们希望，面对代表未来方向的金融新业态，央行也能像工信部对待微信与移动运营商的竞争一样，静观其变、顺势而为，这也是国家越来越自信、开放、大气的体现。

图/CFP

用科学方法衡量发展成果

□ 郑 念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这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指标，也是总理为本届政府新一年工作所制定的考核指标。值得关注的是，它不再用GDP作为单一指标来考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而是用一组指标来进行综合考量，并且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评价方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些做法也倍受诟病和指责，其中，对于改革成果的考核，以及建立在考核指标上的官员升迁制度，就颇有争议和批评。多年来，各级政府以GDP作为衡量各地发展的唯一指标，各地官员为了升迁，也都拼命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历届两会上，也都会大谈特谈如何保持GDP的增长速度。虽然中央一直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学发展，但是，由于评价体制和考核方式存在缺陷，导致一系列正确的主张一直未能实现。

评价指标具有指挥棒作用，影响着人们的判断、选择和决策。如果评估体系不科学、不系统、不全面，如果缺乏科学的评估思维，用单一指标考核系统问题，就很容易导致系统性错误，发生严重的系统运行偏差。事实证明，科技越发达，人类的行为选择越要慎重；系统越复杂，越要用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来指导选择和决策，也就越需要用科学方法来衡量发展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各种复杂的系统问题，国际上一些评估专家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了评估思维，开发了一套评估思维工具对社会事务进行科学的评价。这是一种多角度、全方位对事物进行审视、度量、判断和决策的思维模式。它是人们依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掌握的事实，来处理社会环境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方法。从这方面看，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发展成果的要求和考核无疑也是这种评估思维的具体运用，具有创新性。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要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还需要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也具备这种评估思维。如果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只是看到GDP的增长速度，而看不到就业、物价水平、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要求，同样还是难以避免唯GDP论英雄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和科学发展。只有各级党政领导基本具有评估思维，才能使他们自觉摆脱用GDP单一指标衡量政绩的思考模式，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评估思维在需要对事物进行判断、选择和决策的地方特别适用，其核心是发现、学习、促进改善。当然，科学的评估，需要民众的参与，其目的是实现有利于多数人的决策，使得做出的选择和决策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这既是“公众利益优先”原则的体现，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

突发事件留下的不应只是恐惧

□ 卢阳旭

近日，成都、广州相继出现了所谓的“逃散”事件。事后证实，这两起事件均是由于有谣言称“有人砍人”造成的。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面对突如其来的安全威胁，躲避、逃跑是一种正常的安全本能反应。与此同时，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其情绪很容易被群体情绪所感染，其行为也很容易被群体行为所裹挟。因此，无论是此次的逃散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群体踩踏事件，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有人感受到安全威胁，并做出逃跑反应，然后带动整个人群惊慌逃散。

作为行动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安全威胁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第一反应，并进而影响个体和群体后续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安全威胁是指，被个体主观识别的安全威胁，与实际的威胁相比，它可能被缩小，也可能被放大。可以想见，在平日，当人群中有人喊“有人砍人”时，也有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逃散行为。但此次发生在成都春熙路和广州沙河的逃散事件，之所以会被“有人砍人”的谣言瞬间引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刚刚发生的昆明“3·01”事件后，人们形成了一个集体记忆，即“有人砍人”是一个危险行为，这种记忆会影响人们对于“有人砍人”的安全威胁程度的评估。

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体验都表明，人的很多行为是习惯性的、模式化的，依靠先前存储的各种类型化知识。通常来讲，情况越紧急，人们越可能启动这套建立在类型化知识基础上的快速反应机制。考虑到昆明“3·01”事件刚发生不久，关于这类突发事件的集体记忆清晰而强烈，很容易被瞬间激活。

明白了记忆对于人们的安全威胁识别、评估以及行为模式的影响后，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公众需要有什么样的突发事件记忆？显然，它不应该仅仅是关于恐怖场面的情绪性记忆，它还应该有关于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的知识性记忆——没有后者，防患于未然无从谈起。

对于大多数中国公众来讲，虽然通过媒体“耳闻目睹”过国外的恐怖主义，但对于它们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边，却还显得陌生和不知所措。面对这类突发事件的现实威胁，相关的应对方法和技能更必不可少。如此，在面对威胁时，公众才不会显得那么的慌乱、无助，甚至发生慌不择路、忙中出错的二次伤害。

未来一段时间中，我们可能不得不在一个有这类突发事件威胁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要保证绝对的安全，除了能力上的现实约束外，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可能过高。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确实应保持清醒而有戒备的状态，但不应生活在恐慌当中。正因如此，在公众关于这类突发事件的记忆中，不应该只有情绪记忆，更应该有如何正确看待威胁、如何有效防范和应对的知识记忆。

分数还是相对公平的

□ 杨 雪

高考改革在今年两会上貌似有了明朗的风向。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表示，高考改革围绕着解决“分数决定一切，一考定终身”这个弊端入手，关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教育部已经做了明确的部署，今年就会有很大的动作，各个省和各个地区也都在研究自己的方案。

虽然具体的做法还没明确，但看着不觉有些后背发凉。如果真如这位校长所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综合评价一个学生的潜力，那可就“热闹”了。在几乎能决定学生命运的考试中引入其他评价因素，比如社会责任心、道德，用什么标准？该怎么考察？要历时多久？又如何检验评定结果？

一个自主招生，而且还是需要凭考试成绩取得资格的客观评判，都已然可以因为其中的可操作性开出了不菲的价格。难以想象如果开展道德测评或者别的什么“软指标”，学生家长又该怎样“各显神通”为孩子谋求一个理想结果。记得我们中考的时候，加了一项体育考试30分的成绩，精明的家长就早早找到体育老师打好了招呼，这些同学也都得到了29、28的高分，而如果家长比较老实，学生就只能正常发挥，正常得分，基本没有27分以上的。

只不过在有客观标准的跳高、跳远、投掷上附加了人工干预，一米八就可以变成两米。那么对于需要更多主观评判的责任心或者道德，恐怕连真伪都难以鉴别，更何况对这种评价的验证和监督了。在当下中国社会，一旦评价体系里掺进了主观人为因素，你懂的。

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拘泥于考试形式的变化和创新不会带来变革。如果在其他外部环境照旧的情况下，我宁愿相信分数能够维持一种相对的公平。

为什么一定要让猫打败老鼠？

□ 徐 玢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魏哲吐嘈动画片中猫斗不过老鼠，认为这违背自然规律，并建议在动画片中增加法律知识教育。此番吐嘈蕴含着对下一代的深深关切，对普法的饱满热情，但要拿动画片开刀却值得商榷。

魏哲提到猫斗不过老鼠的情节，我猜测说的是动画片《猫和老鼠》。从这部风靡全球几十年的动画片中，魏代表看到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剧情。而作为一位熟知动画片故事情节的70后，我看到的更多是猫与鼠之间追逐打闹的乐趣。动画片中愚笨的猫与机灵的老鼠之间虽然纷争不断，虽然争斗的方式有时略显夸张，却未有一招毙命的伤害，犹如邻里之间的寻常生活，争吵却无害，琐碎却温馨。把这样的猫鼠关系拿到现实生活中，当然行不通。但这仅仅是一部动画片，一部让几岁孩童初始世界美好生活趣味的动画片，为什么一定要让猫打败老鼠，要让恃强凌弱的残酷替代超越常识的童趣？

之所以将一部动画片的剧情上升到违背自然规律的高度，大概是为了推销在动画片中增加法律知识教育的观点。这样的想法出发点是好的，现实中却很难行得通，首先遇到的就是国产动画片创作力的难题。谈及动画片，年长者会对《大闹天空》《小蝌蚪找妈妈》念念不忘，年轻人想起的是宫崎骏、梦工厂，孩子们则乐于谈论功夫熊猫、神偷奶爸，它们的影响力远非喜羊羊和光头强可比拟。而回想过往那些以传递知识为目的的动画片，有多少被拍成了字正腔圆的样板戏？又有多少知识真正进入了少年儿童的心灵？用动画片来普及法律知识，其结果很可能是又多了一批无人问津的动画片碟片。

而回到动画片本身，我也不赞同在动画片中增加法律知识教育。借助虚拟人物和高科技手段，动画片的表现范围能大大超越实景剧，而想象力是一部动画片是否成功的关键。孩子从动画片中获得多少乐趣，动画片能激发孩子多少创造力，也都取决于它所体现的想象力。确实，动画片应当弘扬正确的是非观，但要让它承载起法律知识教育的功能，就好比让风筝负重。哪怕是些许的重量，都会影响风筝自由飞翔的姿态。

龙应台的一本《孩子，你慢慢来》，让无数父母深切认识到孩子在成长的岁月里，有着无数体会人间百态的机会，不妨让年幼的孩子放慢脚步。如果把这句话用到孩子的动画片上同样正确。在成长的岁月里，孩子们有的是机会接受各种教育，不妨暂且让孩子的想象力在老鼠打败猫的动画世界里自由翱翔。

教育改革岂可一刀切？

□ 许秀华

今年两会，政协委员葛剑雄直言不满高考改革方案，认为它没有好好地慎重听取各方意见。这里要说的是基础教育中的小升初问题。基础教育是根，高等教育是花。根部发育不好，何谈花繁果硕？

北京取消小升初统考后，孩子们要参加的考试反而更多了。依我看，名义是减负，实则是增负。其根本症结在于缺失明确合理、公开透明的考察筛选机制，各类潜规则盛行其中。

2014年初，教育部和各地教委纷纷出来新政，“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就近入学，禁止择校。”这是拯救童年的诺亚方舟吗？

一个政策好与不好，不在于条款多动听，而在于其条款是否留有“不适当的余地”。大派位自1998年推行后从未放弃，为何择校却愈演愈烈？就在于“不适当的余地”，如推优和特长。择校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本是天然存在的，但是长期实施的重点校、示范校政策，却不适宜地加强了这种不均衡。大派位的出发点既是均衡教育资源，则不应以推优和特长的名义，额外为某些孩子开辟上名校的“绿色通道”。这种做法客观上突出了名校的特殊地位，无异于抱薪救火。而推优和特长，获奖项目繁多，要求参差不齐，为一些“有办法”的家长和学校进行勾兑、上下其手大开方便之门，导致教育界雾霾浓厚，民怨沸腾。

新政中，仍存留有这种不适当的余地。如小升初中实现派位的中学仅达到90%以上。那么，余下的10%是什么样的中学？前一次大派位的失败就在于某些重点中学不参与派位，或派位名额有限，有大派位之名，无大派位之实。小学生无缘家门口的重点中学，只能去几站路外去上派位的中学，“就远入学”。

回到大派位本身，它是公平的吗？教育均衡，均衡的是学校的教育软硬件，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们的受教育机会，而不是不同孩子们接受教育后能达到的学业水平。因才施教，有教无类，是我国倡导了几千年的教育原则。大派位表面上看起来公允，实则恰恰违反了因才施教的原则。

义务教育阶段要保证的是每个适龄儿童都有接受国家义务教育的机会，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学，但是这并不等于在此阶段取消学业筛选考察机制。教育平权，不是园艺学上的遏制顶端优势，而是恰恰需要一部分孩子去发挥方方面面的“顶端优势”，在文学、艺术、体育竞技各个领域展现中华民族的风采，在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各个领域为炎黄子孙谋福利。

大派位让家长普遍不愿意接受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腐败：某些孩子可以靠“拼爹”，靠家长和中小学的“友好关系”，以推优和特长的名义逃避派位。当规则不明确、标准不统一时，这些“高明运作”就会野火烧不尽地发生。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在实施大派位之前，首要考虑的应是，如何减少或者根本消除派位中中小学校长教师们的“操作空间”。

教育面向的是千家万户，维系着社会稳定和民族未来。拯救童年，教改更应侧重教育体制内部的整顿改革，而不应仅向外部，向家长和学生们发力。否则，简单的一刀切，即使能切下去，又能切多深？

应大力扶持学分银行

□ 李锋亮

在过去的近40年里，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多人认为这背后一个巨大的动因在于中国政府坚定地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高。为了使中国经济依然能够继续保持较为高速的健康增长，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平也必须持续高质量的增长。因此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加方便的进行学习，最大限度地解除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各种制度性障碍，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社会。

当前时代呼唤一个更为灵活的教育系统，一个能够和劳动力市场实现无缝连接的教育系统，使每位公民均能够突破时间、金钱、距离的限制，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地点实现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转换。学分银行便是一个能够帮助学习者实现在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灵活转换、以学分制度为基础的、开放式的终身教育管理体系。通过学分银行，学习者能够将自己学习得到的学分通过零存整取的方式，不断累计、认证，达到一定标准后，就可以换取相应的学历或职业资格证书。

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欧盟和韩国等都在从政府层面大力推进学分银行或者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以推动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然而要建成学分银行体系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学分银行的建设要协调不同的学校、教育子系统、甚至教育系统以外的各社会子系统，需要重构学习者与办学机构之间的关系，要打破很多现存的利益格局，将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难与阻碍。以目前国家层面学分银行运作最好的韩国为例，经过10多年的建设，韩国的学分银行系统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比如很好地打破了不同类型教育的界限，促进了教育公平；但韩国学分银行的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由于学分银行的质量保障存在困难，导致社会认可度并不高等。

我国也已经认识到了学分银行制度的重要性，并开始从政府层面推动相关方面的研究与试点。比如教育部就批准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研究与实践”的项目，旨在为我国推动“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实践模型和政策咨询。

可以预见的是，在我国建立学分银行体系的过程中，也必定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与挑战。由于学分银行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特征，那么政府尤其应该在初始阶段加大投入。学分银行不但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而且还和交通、电网一样属于一种基础建设，政府只有在建设初期进行相当的投入，才能让学分银行达到一个可以运营的最低标准，进而逐渐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状态。

譬如小额金融信贷系统，虽然按照其产品性质划分，更多的是属于私人产品而非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小额金融信贷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而且如果初始投入不足，则很难实现可持续运营的状态。因此，各级政府对此均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扶持与财政投入的措施。对于小额金融信贷，尚且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学分银行的公共产品属性更加明显，其建设更加复杂，因此政府理应在建设初期加大投入力度。

由于学分银行系统的构建需要协调各个教育与社会的子系统，因此在战略部署上首先要有全国性质的顶层设计与规划。而在战术推进上，要实行分步走的策略，如同当年我国互联网的建设一样，先建成一个个的子网，然后再打通各网，形成一个总网。就地区而言，可以先在北京、上海、广东这样的发达地区试点、建成。因为这些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各种合适的支持条件，比如丰富的教育资源、相对完备的个人信息系统等，更为重要的是流动人口趋向于迁移到这样的大城市，学分银行的客户群相当充足。就领域而言，可以先从远程开放教育等领域着手，因为远程开放教育本来就具备开放、资源共享的特点，学分的认证、转换工作也相对更容易实施。